

# “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

李如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 厦门 361005)

**摘要:** 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重大差异是汉语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是汉语采取的是表意的汉字。对于这个重大的差异,我们还研究得很不够。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判别,如何规范? 都尚待深入探讨。在母语教育,虽然新一代学生的普通话有了明显改进,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有待提高;在对外汉语教育中,由于学习者缺乏语感和语境,掌握书口之别更是无门。对外汉语教材应该就此作出更大的改革。

**关键词:** 书面语; 口头语; 汉字; 表意文字; 语言特征; 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8)03-0005-08

**DOI 编码:** 10.14095/j.cnki.oce.2018.03.001

## 一、“书”“口”之异是汉语的重要特征

本文所说的书口之异指的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以往有人也称为文白之异。不过,文与白通常说的是文言与白话,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白话文是现代的书面语,但是,古代也有口头语,可称为“古白话”;现代也有口头语,只好称为“新白话”了。文白之异有时也用来称说字音的文读和白读之分,普通话和许多方言的一些字有两种或多种读音,一般说来,作为书面语词呼读的音是文读音,口语词说的音是白读音。在方言里,文读音比较接近古今通语的音,白读音则是方言口语中经过变异的土音。不同时期形成的方言词有不同的文白读,常常又反映了方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语音历史层次。可见,这两种文与白和本文所说的文白有些关系,但是又有许多不同。

在语文教育中,书面语和口头语有时也简称为“语一文”之别。语文课的“语”和“文”,本来就是指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语文课就是进行口头听说和书面读写训练的课。在国外,“汉语”一般指口语,“中文”则指书面语,和这种说法相近。但是,书面语、口语都是“语”,语文课的“文”又牵连到“文章、文学、文化”,因而书面语和口头语之异一般不说成“语一文”之异。

有文字的语言就有书面语,书面语的交际功能、交际场景和交际手段和口头语都不一样。书面语多半是背靠背的、借助文本、超越时空的传播;口头语则是面对面的、借助声响所作的现场的口耳传递。为了适应交际场景、功能和手段的不同需要,各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在遣词造句和语音处理、语用表达上都会有所不同。在语音处理上,书面语主要是讲究节奏和韵律,口头语还要有音

收稿日期: 2017-04-03

作者简介: 李如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Email: lirulongchina@126.com

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响和语调的处理;在词句的组织上,书面语力求精炼、有蕴含,口头语则侧重于让人能很快听明白;在语用表达上,书面语讲究内容典雅、语言规范,口头语则务求听得愉快、反馈迅速。正因为如此,学习任何语言都得分别进行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训练,掌握听说读写四种本领。

然而,书面语和口头语在一些语言差异大,有些语言则差异较小。汉语就是属于差别大的。请看:

夜半歌声——半夜里听到的歌

写于深夜里——下半夜写下的

勿忘国耻——别忘了国家的耻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底下有知心的人在,虽然远在天边,会像是就在身旁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汉语的书面语讲究简练,好用文言成分,少用虚词,用词和句式都和口语有明显差别。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差异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语采用了表意的汉字,书面语和口头语分道扬镳已久,各自又经过了长期的加工提炼,形成了各自的词汇、语法和表达系统。

汉语从三千年前就采用方块汉字作为书面记录形式。最初出现的汉字多是象形和表意(指事、会意)的,后来的“假借”字因为造成同音,没有得到发展,再后来出现的形声字,表义的形旁类别不多、表义太粗,声旁的表音也不细、不准。而且,造字之后,语音多变、字形稳定,造成了字形和字音的更大分离。所以汉代定型的“隶变”,成了表意为主的文字系统。《说文解字》收字八千多,汉字的规模大体上就定局了,虽然形声字占到80%以上,表音度还是很差。由于受到音节数的限制,先秦单音词占优势的局面不利于大规模扩展词汇,汉代兴起了利用表意汉字合成双音词,果然为词汇的扩展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汉字的表意性质便为汉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汉语和汉字相结合千年之后达成的新的和谐。最常用的单音词和双音合成词构成了汉语词汇系统的雄厚基础,为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唐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两万多个汉字及其不断滋生的多音合成词,用来构筑种种书面语,包括诗词歌赋和议论记叙,可谓畅通无阻。经过世世代代的文人学士的加工提炼,所构筑的“经史子集”成了一道精神文化的万里长城。但是,由于汉字的不利表音和形体结构的繁难,在古代社会,能够识文断字的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书面语也就成了统治者发布文告、施行教化,文人学士们舞文弄墨的专利品。平民百姓的口语则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世代相承、不断发展,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表达方式,经过戏曲、说唱、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的锤炼,也形成了一套丰富多彩的表达体系。虽然书面语有时也会落入口语,口语也会被一些文人引进书面语,但是二者确实是沿着不完全相同的发展道路推进,创造了“两种民族文化”。不论是拿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和敦煌变文做比较或者拿明清政论、散文和通俗小说做比较,都可以看到,这数百年间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就像是长江和黄河一样各自形成了系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数十年间,文言和白话的对抗和论争,就是这两个系统抢占擂台的过程。

可见,至少到五四运动时期,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道扬镳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史所决定的汉语的重要特征。

## 二、“书”“口”之异的特征尚待深入研究

然而,汉语书口之异的这个特征在“五四”以前是一直就没有引起关注并开展相关的研究的。就像长江黄河各行其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传统“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只研究经典文献,不论是字音、字义,只是为了诠释古代传下来、已经不太明白的书面语。口语的发展演变向来是自生自灭,学者们总认为是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因而不屑一顾。关于口头语和书面语有什么不同,

在古代语文学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什么研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鸣锣开道,借助着宋元白话的艺术成就和普通话的群众基础,经过二十年的反复拉锯,白话终于取代文言,站住了脚跟。在宋元白话文的基础上,经过“国语运动”,一批新的语文学家提倡“我手写我口”、编写新语文课本在少年儿童中传习,吸收了现代普通话口语词汇和语法,加进少量欧化句式和文言成分,在一大批现代文学巨匠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快就建成的现代白话文的独具特色的书面语系统,应该说,二十世纪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先前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

离状态。为了彻底摆脱文言的羁绊,解决言文分歧,使书面语口语化,借着维新运动的东风,激进的改革派从清末开始发起了“切音字”运动,三十年代又有“北拉——罗马字”运动,经过近百年的摸索,最后才发现,汉字不但是汉语的记录符号,还是汉语的结构因子——语素,罗马字拼音只能用来为汉字注音,帮助识字和其他一些场合的应用,用拼音字母来代替汉字是难以实现的。只要还使用汉字,保持着字义合成的构词法,维持着“目治”的习惯,书面语和口头语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还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首先,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究竟有哪些差异,我们还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考察,如今还像是雾里观花。这个差异和历史上的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并非一件事。文言是从上古到中古的书面语积存和凝固下来的,白话先是宋元之后定型的口头通语,明清之后,随着城市文明和小说的兴起,白话形成了自己的书面形式——白话文。经过四五百年的调整和创造,由“早期白话”发展为“现代白话”,才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础。而就在白话文定型的过程中,口语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想当年水浒好汉们的对话和当代农民的口语的差别,就不难体会到这种变化。当代的书面语固然大体以当代的口语为基础,但也加入了一些文言成分、方言成分和欧化成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到现在,也将近一百年了,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尽管语料库语言学已经发展起来,我们还没有把现代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语料进行认真的对比研究,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

看来,现代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语法上。我最近从北京语言学院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略作一点抽样调查,发现这个课题还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在于没有引起重视。在该书的高频词中,我取了前100个,就“报刊政论”和“生活口语”两种语体的词频做比较,相同的高频词只有三分之一(34个),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各不相同的,可见书面语和口头语的用词是异大于同(二比一)。相异的部分分别是那些词,还有些明显的道道。“报刊政论”的高频词中,政治概念就占了近半,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社会、领导、历史、建设、国家、民族、民主、同志、阶级、生产、解放等等;而“生活口语”则有过半是基本动词、指代词和叹词,例如:去、看、走、叫、到、买、想、给、吃、做;那、谁、这么、怎么、什么、这个;吧、呢、呀、啦、吗、啊。不论是共有的和有别的高频词,三类中都有十几个虚词(含副词),例如:的、了、不、就、也、着、都、又、很(共有);没、再、把、可、别、跟、得(口语);而、为、以、所、于、使、最(报刊)。如果再拿“分布最广的100高频词”和这两类高频词做比较,34个“共有”的它都有,此外含“口语”中的28个,“报刊”中的15个,另有与“科普”与“文学”相同的24个。从这个抽查中可以发现,最高频的(包括虚词)是各类语体共有的词,也是分布最广的词。这些高频词很有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就书口之别说,口语中的基本词汇比书面语更多。

如果说,关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词汇差异,已经有了几本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典,算是有人关注了;而语法方面的书口比较就还是一片荒凉。赵元任的名著冠以《北京口语语法》的书名,只能表明他提倡发掘口语中的语法现象、不主张只研究书面语的语法,事实上还没有进行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不同语法特点的比较。

其次,判别书面语和口头语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制作语料库不难,辨别书面语和口头语却不容易,对此,似乎学界还没有做过周密的研究。在单音词和双音词里,大多数是书口共用的,我从国家语委汉字处所编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的“常用字词例”发现:来自文言的常用字构成的单双音词多为书面语,例如:之、之前,与、赠与,于、对于,无、无穷,乃、乃是,卜、占卜,乙、乙醇,仁、仁慈,义、义举,以、以免,未、未曾,击、击打;而未见于古代韵书的后起的口语新造词字及其所构成的多音词则是口头语词,例如:您、别、甩、甬、找、揣、揣摩、拽、瞧、咱、娃、娃娃、楞、妞、小妞儿、垮、垮台。至于四字格,却是比较容易判别是书面语或口头语:来自文言的成语总是书面语,口语造出来的四字格有许多是叠音的、附加音缀的,加用数词组成的则文白两类都有。前者如:以一当十、五光十色、合二而一、人仰马翻、门庭若市、义不容辞、雷霆万钧、良药苦口、名存实亡、仁至义尽;后者如:三心二意、七零八落、接二连三、嘻嘻哈哈、点点滴滴、地地道道、三言两语、三三两两、五花八门、小恩小惠、妻儿老小、十万火急。看来,判别书口的原则也应该从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归纳出来,而不能从理论上推知。有的学者曾用过社会语言学的问卷调查,实际上是语感的鉴定,这也不是不能考虑的方法,因为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对书面语和口头语都有明显不同的语感。

关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鉴别,更大的难点在于书面语和文言词的交叉以及口头语和方言词的交叉。

由于汉语采用表意的汉字作为书面符号,“隶变”后的两千年来,汉字的字形没有多少变化,基本字义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上古、中古的词汇经常会被现代汉语所用,成语、谚语、典故、引用语就是古语沿用于今语的通道。“阁下、光临、拜见”还要经常用于外交场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经常被引用,“登顶、下潜、镌刻、解读、遗存、境况、景观、滞纳”都是从文言来的,一旦需要表达,就端出来用。维权可以设“驿站”,航班可以设“经停”,网络可以加以“遮蔽”,种种“沿袭启用、改装翻新、重新创造”都会使现代书面语和文言词的界限模糊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口语是在官话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官话方言区包括了八九个分区,拥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内部又有许多词汇和语法上的分歧。例如四川人说的“耍下子、要得、晓不得、龟儿子”,恐怕还不能说进入了普通话;山西人说的“阳婆、月明、年时、出水、出汗”只能说还是晋语;山东人说“扎古”,表示“打扮、治疗或修理”,“捻、捻儿、捻子”表示“地方”,把冰说成“冻冻”,也只是地道的官话方言,连字面意思都难以理解。近年来搭乘着小品的快车,东北话的“忽悠”是忽悠了几亿人了,“赶趟”恐怕还没赶上趟。诚然,普通话、北京话和官话方言之间是没有断然的界线的,但是,区分通语与方言总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提起过。

第三,书面语和口头语不但自身的结构特征(语音、词汇、语法)有异,也有语体风格上的不同。书面语继承前代语言多、比较稳重守旧,口头语则适时的创新多、比较生动活泼;书面语主要是目治,注重用字规范典雅,不避生僻字,口头语讲究音响效果,多用常用字造词,不计较“有音无字”;书面语力求简洁精炼,好用典、避冗余,口头语为求刺激常用铺张、描写,不避重复;书面语讲究规范,常常经过修改而定稿,口头语追求快速和易懂,常常从俗就野,旋说旋改;书面语靠咀嚼琢磨,常有言外之意,口头语可借助声响和身势另加发挥;书面语交际对象不在现场,容易脱离情景、无的放矢,口头语身临其境、有针对性,但有时难以应对自如。这些方面在中国原有修辞学、辞章学,曾有过许多成功的研究,新的又有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探讨。除了语言学者的努力,还有许多传媒工作者和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今后若能多方联手研究,必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第四,关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规范问题,这几年来讨论的少了,这说明在规范的问题上现在是采取了比较宽松稳妥的政策,避免硬性地划界,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大变动的现代社会里,语言生活也在经历着强烈的激荡,现实中的问题既多又难,人们有点应接不暇了。在书面语有古语和今语的竞争,在口头语有通语和方言的矛盾,在网络上还有汉语和外国语的混

用,靠一本五万条的中型词典显然不能负担裁决词汇规范的任务。外国的词典有的有词必录、提供读者选择,也有从语料库提取常用、多用的词条引导读者的。近些年来,语言生活的监控做了不少事,也提出了一些有关规范的问题,例如,新词新义问题,广告语言的问题,网络语言问题,字母词问题,义务教育、辞书建设如何服务语言规范,提高中文水平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文(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种种“危机”。看来,调查做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很多,关于规范问题的研究,“硬件”方面、微量方面关注得多些,如字音的审定、字形的整理、字数的权衡一直在进行;“软件”方面、宏观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词汇、语法的规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工作显然还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辞书的编纂空前繁荣,方言调查在点上面上都有重大进展,语料库语言学也正在迅速发展,词汇语法的规范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只是因为规模庞大、问题繁多、有关理论也相当复杂,不是少数人、投放一点时间精力就可以得到效果的。即使有了大团队,做起来也不容易,见效就更难了。

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的通语——普通话,关于普通话的规范,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曾经有过经典的说法: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这个结论提出了已过60年了,有些地方不过细,显得含糊,面对半个多世纪实践,应该有更加具体化的解释:标准音应该排除那些北京话的土音?“北方方言”和现在认定的“官话方言”“晋方言”是什么关系?官话方言和晋方言的词汇不少只在局部地区使用,普通话词汇应该认定哪些官话方言词汇已经进入通语,南方方言也有少量进入通语了,是否还可以考虑让有些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词汇收进普通话的备用词库?如何着手在语料库的基础上建造这个词库?普通话的词汇规范,一般都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在这部中型词典之外,如何来判定更大范围的用词的规范?现有词典所收的带<方>字号的词是被确认为进入普通话的方言来源词或是尚未取得规范的方言词?普通话之中有些明显是专用于口语的词,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但是却没有被收为词目,整本《现汉》收了五万条词语,口语词只有八百条,《对外汉语词汇等级大纲》收词8872个,口语词只有160条,都占不到2%,许多口语中的常用词在词典里查不到,南方人和外国人岂不是都告求无门了?这对于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都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用“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那么普通话的口语语法又应该拿什么作为规范的依据?普通话口语的词汇、语法规范看来比起书面语的规范更难确认,但是又是不得不确认,因为对内对外的汉语教育都必须有章可循。

### 三、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

书口之异既然是汉语的重要特征,汉语的教学要不要针对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采取必要的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母语教育,历来都强调“读写训练”,忽略听和说的口语教学。接受母语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在语言习得中已经大体学会了普通话,建立了一定的语感,入学后有老师的示范、校园语言的熏陶,在普通话普及的地方,还有家庭和社会上通行的普通话交际环境,他们的听说能力一般都会达到基本的要求。但是,对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些问题。

第一,根据世纪之初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所做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全国能使用普通话的人口比例还只有53.6%,(农村则只有45%)在那些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地方,中小学生在课堂外的普通话环境就有局限,尤其是在东南方言地区和民族地区,家庭和社会上局部通行的也只是不标准的“地方普通话”,即使是官话地区,农村里的普通话也带有浓重的方言色彩。可见,完全依赖家庭和社会让孩子学好普通话口语是不现实的。前些年,有些南方方言区的学生考到北方去,因为普通话不过关,一开口就引人发笑,为了面子只好采取少说为佳的策略,以致落落不群,学习、生活

都受到影响,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好转,但问题总还是存在的。

第二,口语训练不但是要求教好标准的普通话,还包括言语交际能力的训练:能自如地应对各种交际对象和场合、适应交际的内容和意图的要求。还应该包括思维能力的训练:因为口语交际必须现听、现想、现说,快速的应对就是一种最佳的思维训练。没有口语课程的专门训练,交际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就不能落实。不少青年上了大学,发现自己的口语能力不理想,于是就订阅《演讲与口才》、参加演讲比赛和辩论会,大学将要毕业,为了升学、求职找工作,怕面试过不了关,又临时抱佛脚,进有关的培训班。这就是中学阶段口语训练未能达标造成的。

第三,任何时代的书面语都必须根植于口语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强盛的生命力。由于普通话的不断普及和文白两面的磨合和发展,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是越来越接近口语了,三十年代的一些美文,因为带着半文不白的文风,和当代的书面语显得不合拍,从语文课文中抽去了,代之以更加符合当代口语的文章,这是合理的做法。今后的读写训练显然还应该强调尽量做到口语化。读要善于欣赏书面的美文,也要能理解怎样为口语进行艺术加工;写要把平实的口语写得通顺,也要具备提炼口语的能力。

可见,母语教育的口语训练不但不能放弃,还应该加强。中师撤消后,承担口语训练的只有高等师范,如今这些高校都在拼科研、争项目,往学术路上挤,口语教材(包括课外读物)的编写和改进,联系本地方的正音、正词练习,教学方法的试验研究,好像很少人有兴趣了。事实上,文与白,书与口,都是相互依赖,通则双美、塞则两败,这是常理;所谓口才好、文笔差,或者文笔好、口才差,都只是个别的现象。

在对外汉语教学,情况又有很大不同。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完全没有习得的基础,所以历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总是集中力量教学口语,先解决听和说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如果是来华的学习者,有了初步的听说能力,就能从广泛的社会交际中学到最鲜活的语言,这正是学习第二语言最宽的路(因为资源广、品种多),也是最近的路(因为机会多、成本低)。如果是短期班的教学,只是为了应付在华旅游或简单业务的一般交流,只学学口语、不教读写也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学习者也完全没有语感,不知道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有许多不同,至少对于处于两端的书面语专用词或口语专用词,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提示,哪怕只在生词表上标上〈书〉或〈口〉,就能使他们轻易地避免许多常见的差误。“我看看罢了(而已),不想买”“我随便说说,您别(不要)生气(愤怒)”“明天咱庆祝他的诞辰(生日)”“他的身体很棒(强壮)”,不论是书语口用或是口语书用,效果都是不好的。打开中介语语料库,这类病句很多。因为我们的课本里很少有书口之异的提示。

来华学习的留学生,离开课堂后只要走进中国人之中,就能学到许多比课堂更加生动活泼的汉语(当然也有劣质的),老师如果善于引导,让他们总结课外交际中的经验和教训、找问题、提问题,一定能使课堂教学得到有益的延伸。结合这类课余的指导,也可以提示如何在交际中体验文白之异。

在国外教学汉语,除了课堂,没有语境可言。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困难。一个星期学几节课,课后不再接触所学的语言,学到手的能有多少,可想而知。补足这个根本缺陷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组织课内的练习和课外的阅读。

就课内练习说,眼下最流行的是针对一个个“语法点”的句型、句式的练习,偏偏汉语又是句法灵活、同义句型繁多的语言,这种乏味的练习究竟有多少效果,值得怀疑。为了克服没有语境的缺陷,要尽量把课堂变成生动语境的现场。有问有答、有讨论有争议,有欣赏有评判。练习的题目和项目最好都是句子连成的篇章,例如成语故事、谚语解释、猜谜语、古诗词、笑话、小相声、短小品、绕口令,形式上可以老师领着练习,可以看录像、动漫、听录音、看电视片段。这种课堂活动,短小精悍,生动有趣,朗朗上口。就像赵元任所说的,在整个儿的句子中学习词的意义和用法,既记住了词

又掌握了句,还有各种文化的内容。这种语境化的练习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后的作业,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做到一体化。课后,不论在家里、在公园、在车上都可以自己掌控。适合不同国情地情的好的读本或声像作品,若能让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随时随地学、在玩儿中学,有了这种自造的语境,何愁学不好汉语!练习、阅读、听录音、看录像,正是为了调动自觉性、养成自学习惯的好办法,也是制造语境、培养语感的好办法。为此,应该提倡大量地编制各种多样化的书面阅读的文本、练习册,口语朗读的音像作品及辅助性的说解,以及不同程度的艺术表演节目。与其守住不合用的课本照本宣科,进行乏味的课堂讲解和练习,不如和学生一起、也鼓励他们自己走进广阔的阅读天地,走进语境,直接接触各种书面语和口头语,从而建立语感。为了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的需要,所提供的读物一定要分别各种不同内容、不同文体、不同场景、不同程度的品种,以口语表达为主,最好是声情并茂、图文兼有、逸趣横生的。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琢磨,我悟出了要搞好对外汉语教学,一定要努力建设两套理想的教材。

一套是体现汉语的结构特征的“字词句直通”的基本教材。在介绍语音构造、训练发音之后,教学常用字,以字带词,通过解释词义来扩大和加深对字义的理解;通过解释用字组词的方式去说明词法和句法的一致性;通过构语和造句来巩固和加深对语法的认识;通过不同遣词造句来体会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通过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言语作品的学习去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在选择字词句的素材时,应该常用先学、循序渐进,求精不求全。编写课文和练习则务求多样化、趣味化,避免模板式的拷贝。这套教材的特点重在语言分析、抓住核心、打好基础,充分体现汉语的结构特征。

另一套是与基本教材配套的开放式的补充教材。这是一套比句子大的言语作品,不强调精当而强调广泛多样,不求严密而注重趣味。内容可以涉及古今中外,有传统的、也有时新的;篇幅应该有长有短、以短为佳,有弹性、可伸可缩;文体载体样式多样,散文韵文、音响图像兼有,文本、网络齐全;言语表达形式不论是文言白话、书面口语、美文应用文都应兼备;就制作方式说,可采集、可编写,可更换、可新添。这套教材的特色是从言语的综合应用出发,通过句段和字词的关联和组织,去理解生成言语作品的法度;通过篇章内容的理解去认识中华文化的底蕴;通过不同语言素材的选择和组织去体会言语表达的艺术;通过不同时代篇目比较还可以考察语言和言语的历时演变;通过目的语和母语的言语作品的比较,则还可以体会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

为了编好以上两套教材,必须建立一个大型的多用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字、词有不同频度等级的字库和词库,有异体字、多音字、多义字库,各种词类及兼类词库,连绵词、叠音词及各类合成词库,同义词、反义词库,已经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外来词及现代还常用的文言词库,各类封闭性词类和虚词的词库,较为常用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引用语也应该建库,语法方面则应有各种句型、句式的例句库、修辞方面有变式句、中介语和地方普通话里的不规范例句,也可以建库。以上所述是“语言库”,此外还要有“言语库”,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韵文,可以按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不同题材、不同体裁归类建库,有些字句已经不再使用或者难以理解的可以适当加以改动。有了这样的大型语料库,配套的补充教材就可以由在外的汉语教师或外国教师根据实际需要自己编印、散发。如果所编的核心基本教材不合国情、民情,也可以由执教的老师做必要的修改或补充。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是更加重要的基础建设。

#### 参考文献: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国家语委汉字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

江蓝生《古代白话说略》,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年。

- 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李如龙《汉语应用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
- 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年。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Language and Chinese Teaching

LI Rulo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language i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basic reason is to use ideographic writing. For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 should further discuss what the main performance is and how to distinguish and regulate. In the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students' oral expression ability still needs to improv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learners are hard to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cause of lack of language sense and context. Therefore, the textbook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hould be make more reform.

**Key words:** written language; oral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ideographic writing;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teaching